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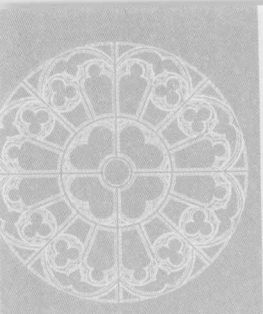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

——王宇博论文选集

王宇博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014035072

K107-53
08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

——王宇博论文选集

王宇博 ● 著



北航

01715051

K107-53
08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王宇博论文选集/ 王宇博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2
(东吴史学文丛 / 王卫平，池子华主编)
ISBN 978-7-5672-0581-9

I. ①享… II. ①王… III. ①世界史—文集 IV.
①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883 号

书 名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王宇博论文选集
著 者	王宇博
责任编辑	许周鹣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581-9
定 价	4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 1900 年的东吴大学。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等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苏州大学。迄今为止,苏州大学已是一所拥有 6 个校区、113 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校。

历史学是苏州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时期。1952 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设历史专修科;1955 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受命南下,创建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系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史中的太平天国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等逐步成为历史系的特色研究领域,出版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左宗棠评传》、《苏州手工业史》、《六朝史》等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世界史教师也通力合作,先后编写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系列教材,在高校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 1983 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成功申报硕士点后,1991 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于 1994 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 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学科。1995 年,结合苏州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现在的社会学院包含了 5 个系 8 个本科专业,而历史学系无疑居于龙头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后,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更为明显,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2005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 年,获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 年,历史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中国古代史获评江苏省精品课程;2010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因一级学科的变化,调整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相应,中国史成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而历史学科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均有斩获,成为科研中的一个亮点。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史学科即参与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出版了“苏南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历史与社会研究丛

书”、“吴文化研究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落实学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各级政府部门既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又承担了多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如:《苏州通史》(编纂)、“苏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等;还构建了“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等重要科研平台。所有这些,都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源于长期办学的深厚积累,得益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更是与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为此,2012年9月,经历史学科诸同仁的充分商讨并得到社会学院的同意,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东吴史学文丛”。“东吴史学文丛”收录了我校历史学科多位在职教授的研究成果,每位教授的成果单独成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教授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特色。

在“东吴史学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王玉贵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书稿责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王卫平

2013年春节

目 录

Contents

- 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 1
- 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 7
-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13
- 英国与一·二八事变/ 21
- 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 29
 - 兼评《李顿调查报告》
- 英国、美国与九·一八事变/ 39
- 评析英国绥靖政策/ 47
- 新界问题与 1942 年中英新约谈判/ 55

- 评析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 63
- 剖析 19 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 73
- 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 87
- 澳大利亚社会对“罪犯烙印”的反应/ 96
- “淘金热”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 103
- 对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历史考察/ 109
- 19 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排华运动探析/ 119
- 19 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排华运动与澳大利亚联邦运动/ 126
- 19 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防务问题之争/ 137
 - 兼论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的形成
- 澳大利亚独立与澳大利亚联邦运动/ 147
- 评析 1900 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 159
- 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 167
- 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 177
- 二战后移民与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衰落/ 183
- 20 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 194

澳大利亚共和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202

解读澳大利亚社会变革/ 212

澳大利亚现代化历史探析/ 222

世界史研究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231

“苏联体系”与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的演变/ 236

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体系”/ 243

文化史学与台湾地区世界史学科体系/ 250

个人研究成果目录(1993—2013)/ 256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代后记)/ 259

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

罗伯特·赫德在华纵横捭阖半个世纪,他虽然不是英国的正式外交人员,但有“一种准外交性质的身份”,深受英方重视。因而,赫德不仅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在英国的远东政策推行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

1863年,赫德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不仅独揽中国海关大权,而且以此为中心,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辐射其影响,尤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要害部门。在“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利益”的旗号下,他始终坚定地秉承英国政府的意旨行事,执行和策应着英国远东政策,尽职于英国的海外事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1〕。然而,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在远东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使英国感到忐忑不安。对此,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是“维护现状”,即维护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由于中国是当时亚太地区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清政府成为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个有分量的筹码。此时,英国将俄国视为在远东的头号劲敌,因为俄国在侵占中国的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后,进一步地虎视中国东北地区,垂涎朝鲜半岛,由此引起了英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885年4月,英俄为争夺朝鲜一时间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在这场角逐和抵抗中,英国推出了承认中国对朝鲜宗主国地位,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维持朝鲜现状的策略。9月,赫德心领神会,推举手下亲信、在中国海关任职多年的墨贤理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之职。此举强化了中国海关对朝鲜的控制,“且也能达到这种表示:即朝鲜是中国的属国”。11月30日,赫德致信墨贤理:“请沉着记好这个可能——希望不久能说肯定——即朝、中海关的联合”;并告诫:“不要太急,梨没有成熟以前,不要摇树的枝叶。”1886年12月4日,他指示墨贤理:“你现在的位置,以及我和朝鲜海关的关系,具有同一基础——那就是朝鲜的从属地位和昭告全世界,说中国是朝鲜

〔1〕 M. H. Bailey, *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1, p. 54.

宗主国的必要性:这点不要忘记。”〔1〕赫德的这一系列举措既满足了清政府力图维持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的愿望,又实现了英国的意图,为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加固了一道“安全阀”。

进入 90 年代后,远东局势日趋险恶。除俄国仍旧虎视眈眈外,新崛起的日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朝鲜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这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地位无疑产生了具有威胁性的影响。因此,英国急于尽力避免冲突,特别是战争的爆发。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英国为防止中日开战,进行过 8 次调解。英国告诫日本:“英国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朝鲜的完整或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国欢迎在朝鲜实现改革,但它“不能对朝鲜涉外规章(指中朝之间的宗主国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化置之不理,也不同意把朝鲜国王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2〕。

1894 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受到震撼。赫德忧心忡忡地写道:“看来今年恐怕是多事的一年。”〔3〕他担心这势必破坏中国与朝鲜的宗主关系,进而削弱英国对朝鲜的控制和引起远东现状的改变。更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介入朝鲜的纠纷和事务。“中日局势严重,已接近战争边缘。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4〕“俄国已在朝鲜边境增兵,在海参崴集中舰队,等‘梨子熟了落在手里’,好捡便宜。”〔5〕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他一方面竭力主张中国出兵朝鲜,敦促对日采取强硬态度,认为:“如果战争能拖延下来,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经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6〕另一方面,他要求:“英国应以实力出头干涉,外交毫无用处,现在机不可失,如不动手,将来局势可能全部改观。”〔7〕他还建议英国尽快派一个“老成持重,说话有力的公使”出使日本,为此,他推荐英驻华使馆代办宝克乐担任此职。

可见,在战争前夕,赫德执行的是英国既定的远东政策,以平息事端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他打出的仍是“中国牌”。

〔1〕 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2),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 年版,第 522 页。

〔2〕 菲·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48—49 页。

〔3〕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 7 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47 页。

〔4〕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48 页。

〔5〕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49 页。

〔6〕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52 页。

〔7〕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58,48 页。

二

7月初,中日军队分别涌入朝鲜,战争一触即发。8月1日,双方宣战。而在这时期,赫德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变化。7月8日,他致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我们现正设法使中日问题不经正式外交调停,自己谈判解决,这对所有的关系方面都是最稳妥的办法。”〔1〕他想通过以中国适当让步为前提的中日谈判去解决朝鲜问题,而他则从中脱身。7月27日,他再次致信金登干:“在事端刚发生时,我曾主张派兵入朝……后来又曾使总理衙门与日本代办子村重开谈判……(现在)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插手,因此就一直沉默。”〔2〕赫德的这一变化伴随英国远东政策的变化而产生。

此时,英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华享有特殊的利益,因此,它不愿看到战争对英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特别是害怕俄国浑水摸鱼;另一方面,由于英俄矛盾以及清政府的腐败,英国又有意借日本之躯来抵挡俄国的南进。这种矛盾的态度使英国举棋不定,因此,它转而采取了“恪守善意中心”的立场,将防范战争破坏其在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为宗旨。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电令驻日使节巴柴特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应对其后果负责”。22日,日本反驳道:“由日本政府独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23日,巴柴特又奉命会晤日本外相陆奥,提出:“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的上海,为英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3〕陆奥当即作出保证。平壤和黄海两场战役后,英国对日本大为刮目相看,“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我们便没有理由同它争吵”〔4〕。为了能使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并防止其他列强乘虚而入,英国以“中立”的面目出现,以中国作出种种让步为条件,在10月间,联合德、法、美、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纠纷,以图尽早结束战争。英国政府将其政策的转变、运筹和确定等过程如实和如期通报赫德。10月15日,赫德收到有关英国调停的具体建议和基本原则的来电:“(1)赔款是首相提议而由外交部采用的。(2)不能希冀列强用武力干涉支持建议中的解决条件……(4)不能希冀英国政府在外行动以外另作单独行动。”〔5〕

赫德闻风而动。恰在10月,英驻华公使离京,同时,焦头烂额的清政府要求通过赫德请求英国出面调停。10月9日,赫德收到英国的绝密电报:“(英

〔1〕《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2〕《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3〕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7—58页。

〔4〕菲·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1页。

〔5〕《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国)把您认作英国公使行使职权,同时又是中国的全权代表看待。”〔1〕这就大大便利了英国的政策策略对清政府的影响。赫德总是如实和及时地将清政府的意图和动向转达英国,这确保了英国在政策和行动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由于中国战败,英国很需要在远东地区寻找到新的同盟者,于是,如何处理英日关系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要内容。《马关条约》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英国决定袖手旁观。当德、俄、法要求英国参加干涉行动时,1895年4月8日,英国“内阁决定: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并没有被日本和平条款破坏到就要采取一种显然是只有武力才能贯彻的干涉的程度”〔2〕。而当日本来拉拢英国时,它也是婉转推辞:已决定对此事完全不加干涉,而协助日本也“不外是一种干涉”〔3〕。然而,这种“中立”立场实际上大大减轻了日本承受的外交压力。日本心领神会,英日关系的密切程度加强。与此同时,赫德再度与英国遥相呼应。当清政府为是否批准《马关条约》而举棋不定时,赫德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游说清政府,“应该批准条约割让土地”。他有这样一番言论:“中国现在如拒绝批准,日本就要打上来,这些国家(三国)决不会加以阻止,让日本夺取更多的土地,那时它们再去找日本,岂不可分得更多的赃物,又可给日本多剩一些使它满意。这种外交阴谋,并不是有爱于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英国除外)虎视眈眈在为自己谋取虏获品。”〔4〕赫德的态度和言论对清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政府宣示批约的明发朱谕中写道:“将一战一和,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5〕而赫德的真实目的是出于执行英国新的远东政策,效力于维护英国的既得利益。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促使赫德态度转变的重要客观因素。自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标榜的“自强”、“求富”,使不少中外人士以为雄狮开始觉醒。当甲午战争迫近时,“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的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6〕。赫德也认为:“日本人现在虽然正占上风,但是,中国也在天天进步。”〔7〕但是,战争爆发后,赫德发现: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李鸿章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虽曾吹嘘得很厉害,但也证明都远非一般所期待的那样”〔8〕。几场战役后,赫德看

〔1〕《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2〕《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辑》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6页。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5页。

〔4〕《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7页。

〔6〕《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7〕《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8〕《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到:中国“最好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海军已不能出海”〔1〕;“募集的新兵既无训练又缺乏斗志”〔2〕。更令赫德惊讶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和懦弱,“这样摇摆不定和缺乏骨气,真使人吃惊”〔3〕!李鸿章“除了谈洋务仿佛很内行之外,与其他中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不同”〔4〕。赫德意识到中国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看来敌人也许会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遂其征服大欲”〔5〕。对英有利的远东现状不能够利用中国来维护。

三

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赫德贯彻和执行了英国的方针政策,为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使出了浑身解数,英国十分器重这位忠诚的马前卒。但是,在对待英国远东政策上,赫德与英国政府之间则存在很大的意见与分歧。他在忠实地执行英国的政策的同时,又对它持怀疑态度,并大加抱怨和抨击。这已是家常便饭。英国也经常不采纳或不理睬他的建议。当得知英国新委任的驻日公使不是宝克乐时,赫德大为气恼。1894年9月间,英国坚持“中立”。赫德又十分不满,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英国对此事漠不关心,将来对此只有自食其果。”〔6〕在“三国干涉还辽”问题上,赫德对英国的政策和策略又持怀疑态度:“如果俄、德、法的干涉成功,英国的地位必将低落”;“英国已经被甩在一边,中英将更加疏远,那么,我也只好辞职了。”〔7〕

在维护英国远东利益和阻止俄国南进等前提性问题上,赫德与英国政府是一致的,而双方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是支持老大的中国,使它恢复健康和实力呢?还是立即帮日本,来博得这个新兴帝国的欢心?”〔8〕赫德选择的是前者。在他眼里,日本同俄国一样是有害于英国在华利益和远东现状的,“如果结果是日本赢了,把中国拿在手里,它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且也许会是大家所从未遇到的强横帝国”〔9〕。“如果中国失败,日本或将派自己的人来,海关自然要消灭,我虽觉得可惜,但不知怎样能避免这不幸的收场。”〔10〕因此,他主张通过帮助清政府“恢复健康和实力”,用“中国牌”来抗日拒俄,所以,他对英国的“中立”立场表示不满,“我以为没有人出头来拦阻日本是一个

〔1〕《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2〕《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页。

〔3〕《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4〕《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5〕《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

〔6〕《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

〔7〕《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8〕《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页。

〔9〕《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8,71页。

〔10〕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页。

耻辱”〔1〕。

然而,英国政府则是通过对中日两国的国力分析和实力比较,得出结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不可救药,积贫积弱的中国已不能被视为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有效的屏障。《泰晤士报》的社论指出:“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2〕以追逐“永恒利益”为宗旨的英国外交决策集团在不危及英在华利益的前提和原则下,决意利用日本来抵抗俄国南下扩张的任何企图,并求得英国在同俄国相遇的远东其他地区中的自由行动。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安危存亡已漠不关心。金伯理就辽东割让给日本是否危及中国安全一事曾表示:“如果把它(中国)的都城迁移至旧城南京,庶能根本上消除威胁它的危险。……英国利益主要地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3〕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根据中日两国力量的对比,英国对其远东政策作出了策略上的变更,不再把中国视为英国扼制其他列强在远东地区发展和渗透的力量,而是通过采取制造列强之间的牵制或直接出面的方式来维护其远东利益。这种新的远东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相比较可看出,赫德在思想上还固守着他来华以来的英国远东政策的原则,并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对英国新政策所表现出的种种困惑、疑虑和不满恰是英国新旧远东政策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当然,这种分歧不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在甲午战争中,赫德与英国政府不仅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而且,赫德的那些困惑与费解化解消失在他们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和对共同利益的追逐中。

在甲午战争中,英国以“中立”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对日本的放纵和偏袒,日本也因此胆量逐增,得寸进尺。清政府则因英国的政策变化而焦急不安,手忙脚乱。李鸿章曾企图以寻求俄国的帮助来刺激英国,求得重获英国的“支持”,但无济于事。这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加速了它投降屈服的进程。具有双重身份的赫德则毫无顾忌地支持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活动,确保了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和外交意图的实现。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 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2〕 菲·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2页。

〔3〕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辑》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4页。

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 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

在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为始、以 1933 年 3 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由于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1〕,因而,它的对日政策对事件的演进和局势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在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大多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笔者拟就若干观点提出商榷。

一、英国对日政策是否是绥靖政策

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在中国史学界持否定观点者居多,认为:“英国的政策的实质是绥靖政策”,它“首先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的……”〔2〕对于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说法是套用英国在欧洲推行的绥靖政策的概念和形式,等同了英国在欧亚两地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有姑息侵略者和牺牲他国利益的内容和手段。但是,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其目的是要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出“鹬蚌相争”的格局,用德国来牵制苏联和法国,又用法国来遏制德国,以牺牲小国来缓和与避免英德冲突。而在亚洲,英国则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通过殖民侵略所获得的利益,力图限制和阻止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即日本)的扩张和竞争,以平息事端来维持现状。由此可见,英国的政策是一种根据自身实力而采取的被动与温和的遏制政策,是英国海外帝国政策的一部分。

在整个危机期间,英国对日政策的内容是以维护英国在华及整个远东的既得利益为宗旨,以对付日本的扩张活动为中心任务。虽然英日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竞争和抗衡日益激烈,但是,英国努力避免经济对抗波及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因为英国把日本视为维持远东现状的关键,如有不慎,在

〔1〕 M. H. Bailey, *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1, p. 54.

〔2〕 汪文军:《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远东,“英国会失去防范混乱的屏障”〔1〕。英国设想在既不与日本发生冲突,也不激怒中国,防止卷入纠纷的前提下,用“和解”的方式,平息风波,达到不改变现状的目的。为此,尽管英国偏袒和放纵日本的所作所为,压制中国的反抗,甚至为了制造“平衡”而牺牲中国的利益,想以此满足日本的部分欲望来防止事态的扩大。但是,它在与其他列强分享中国这块“肥肉”时,不愿看到日本对某一区域的独占局面,担心会由此对英国的利益及其发展产生阻碍和不利影响,因而,它又谨慎而明确地强调中国的领土完整,不仅反对日本把东北变成其殖民地或保护国,而且还反对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英国仅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只允许东北“自治”,以此来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并力图避免引起整个中国的政局动荡,致使“英国与四亿中国人的贸易将会因中国的联合抵制而面临危险”〔2〕。英国这种在中国主权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的做法与英国在欧洲坐视或承认法西斯德国践踏和吞并他国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形成明显的对比,反映出两种政策的区别。

在这一时期,英国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以防止自身在远东利益受到日本挑战和损害为出发点,看待和评价日本的行动,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政策。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而对英在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程度的波动,英国三易其对日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从九·一八到一·二八,由于英国在华利益未受到日本侵略活动的直接威胁和损害,加之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因此,英国对此未予重视,采取了“不干涉主义”政策,“捍卫中国的‘行政领土的完整’,根本不是英国外交部最迫切的任务”〔3〕。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使英国开始认识到日本制造远东危机的严重性〔4〕。英国在无力采取强硬政策的情况下,积极而又温和地推行息事宁人的“和解政策”,急于平息上海的战事,并通过外交手段,将日军逐出中国内地。1932年5月至1933年3月,为了确保英国在华利益和战后远东和平现状不再受危害,就必须不使日本在华随心所欲。因此,英国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奉行“平衡政策”,试图以牺牲中国的东北

〔1〕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1972, p. 292.

〔2〕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1—1933*, p. 264.

〔3〕 *The Times*, Jan. 11. 1932.

〔4〕 Rohan Butler,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IX* (以下简称 *D. B. F. P. Vol. IX*), London, 1965, No. 152, 155, 238, ect.;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1—1933*, p. 217.

“自治”，丢卒保车，防止日本独占东北，遏制住日本向长城以南地区的侵略和渗透。

《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和体现。可见，此时的英日矛盾是围绕如何瓜分中国而展开的，所以，英国的政策是为了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进行的对抗而制定的。就其政策而言，也不应把英国袒护日本、牺牲中国、压制中国的反抗等手法视为绥靖政策的伎俩，因为这是英国惯用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在近现代史上，在向海外扩张及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的活动中，英国屡屡使用它们。

二、英国对日政策是否属反苏政策

持“绥靖政策”论的学者把英国的政策称为反苏政策，认为它“希望能使日本同苏联冲突起来，从而削弱苏联”〔1〕。英国“……企图牺牲中国，让日本通过东北这块跳板去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2〕。这种提法明显雷同曾流行一时的“祸水东引”论。诚然，英国是一向反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中国，当时不存在英国推行以反苏为目的的绥靖政策的前提和必要。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英国在远东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威胁。虽然英国有时也担心苏联的势力会南下，但是，日本在满蒙的发展已构成了一条防御带，更何况英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影响和左右日本。因此，在远东，英国不需要、也没有力量来推行类似在欧奉行的绥靖政策，制造均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确有一些英国要员幻想利用日本来反对苏联〔3〕。不过，这种想法只是英国政府内少数人在事变初期所持的一种异想天开的观点，后又无人问津，没有对英国的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不能把某些英国要员的只言片语作为英国政策的基调和主流。当时英国对苏联的真正想法是担心苏联借远东危机，从中渔利，或日苏联合，向南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十分注意苏联政府对事变的态度、苏日关系的状况以及苏军在远东地区的调动和部署，进而作出估计：“苏联无意采取行动。”〔4〕

〔1〕 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页。

〔2〕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北京：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1—1933*, p. 177.

〔4〕 D. B. F. P. Vol. IX, Enclosure 2 in No. 2.

三、如何看待英国的“调停”行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国联合美国积极进行调停,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中国学者对此时英国的政策和行动大加抨击,不乏“勾结”、“妥协”等词,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为“助纣为虐的行动”〔1〕。而西方学者则将调停成功和停战协定的签订视为英国的一次外交胜利,称一·二八事变后的英国对日政策“标志着英国政府对日态度的一个转折点”〔2〕。

上述提法和观点都有片面之处。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对日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政策的要点仍是关心和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努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帝国主义的利己主义仍是英国对日政策和远东政策的基点。在英国,上至首相和外交大臣,下至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在思想和言论上都表示出偏袒日本和“对拯救中国没有兴趣”的情绪〔3〕。然而,英国对日本的不满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遵守瓜分规则,把触角伸进别人的势力范围而产生的“愤怒”。1932年1月31日,英国《观察家报》写道:“我们原谅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但是……任意进攻所有的国际利益都汇合在那里的上海,则是另一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对日政策由消极防御性转变为积极防御性,由九·一八事变后的以“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依赖别人,尽自己的本分。……对日本——我们不愿实施制裁”〔4〕为主要内容的既定方针,变为一·二八事变后即“……致力于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和更稳定的国际关系。……保持我们的地位和不允许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业已建立起的位置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坏”〔5〕为内容的基本策略。在执行手段上,由力图把英国置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上,“避免任何会被日本或中国明显认为我们是倾向他们的行动”〔6〕,转变为由英国出面,单就上海问题进行“和平调解”。所以,就动机、内容及执行手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的政策有了重大的变化,但不能称为带有本质变化的“转折点”。

〔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2〕 Ian Nish, *Angle—Japanese Alienation, 1920—195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

〔3〕 D. B. F. P. Vol. IX, Enclosure 2 in No. 120, 172, 216, 239, 390, etc.

〔4〕 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1—1933*, p. 189.

〔5〕 D. B. F. P. Vol. IX, Enclosure 2 in No. 534.

〔6〕 Rohan Butler,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VIII, London, 1960, No. 538.